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

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

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

近代中国史家学记

史学方法论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英国文化史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刘揆黎史学论著集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

京师范大学历史讲义合刊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

历史综合法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王东 李孝迁 / 主编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陈啸江 / 撰
王传 /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 陈啸江撰; 王传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ISBN 978-7-5325-9008-7

I. ①陈…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5616 号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陈啸江 撰

王 传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75 插页 5 * 字数 358,000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08-7

K·2569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

“重构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1901-1949）”

（2017-01-07-00-05-E00029）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

（项目批准号 18ZDA169）

丛刊缘起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史料、新视野和新方法，而新史料则尤为关键。就史学而言，世人尝谓无史料便无史学。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无独有偶，陈寅恪亦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顺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王、陈二氏所言，实为至论。抚今追昔，中国史学之发达，每每与新史料的发现有着内在联系。举凡学术领域之开拓、学术热点之生成，乃至学术风气之转移、研究方法之创新，往往均缘起于新史料之发现。职是之故，丛刊之编辑，即旨在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向纵深推进，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

当下的数字化技术为发掘新史料提供了捷径。晚近以来大量文献数据库的推陈出新，中西文报刊图书资料的影印和数字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近代学人文集、书信、日记不断影印整理出版，凡此种种，都注定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史料大发现的年代。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图书资讯极度发达的年代，当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绝好机遇，做出更好的研究业绩。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大多关注史家生平及其著作，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如果放宽学术视野，把史学作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互相联络，那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所凭借的资料将甚为丰富，且对其也有更为立体动态的观察，而不仅就史论史。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史学文献资料尚未有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从而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适值数字化时代，我们有志于从事这项为人作嫁衣裳的事业，推出《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计划陆续出版各种文献资料，以饗学界同仁。

丛刊收录文献的原则：其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丛刊以发掘新史料为主，尤其是中西文报刊以及档案资料；其二“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丛刊并非常见文献的大杂烩，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力求涸泽而渔，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使之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我们立志让丛刊成为相关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这项资料整理工作，涉及面极广，非凭一手一足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便可期而成，必待众缘，发挥集体作业的优势，方能集腋成裘，形成规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长久深厚的学术传统，素为海内外所共识。我们有责任，也有雄心和耐心为本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在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这些努力或许不被认可，然为学术自身计，不较一时得失，同仁仍勉力为之。

欢迎学界同道的批评！

前 言

陈啸江(1912—?),名国治,以字行。福建闽侯县(今福州)人。1929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与傅衣凌、庄为玑等人成立“厦门大学历史学会”,^①宣扬“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1932年,在朱谦之的影响下,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次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师从朱谦之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参与创办《现代史学》杂志。毕业留校任教后,积极筹备成立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拟定《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划书》,扩大中山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陈氏深受朱谦之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著有《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三国经济史》等专著,并在《现代史学》、《食货》等杂志发表数十篇有关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论文。正是凭借着出色的研究能力,他1941年被评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年仅三十一岁。^②遗憾的是,陈氏在1940年代末出国后,从此便淡出学界,这也是其研究成果及学术价值至今鲜少有人道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新史学流派层出不穷,精彩纷呈。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将转变时期的中国新史学家归纳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两大派别。其实,在周氏之前,朱谦之则将民国时期的新史学概括为“唯物史观派”与“考古考证派”两大派,并对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考古考证派“偏于史料,而将理论完全忽

① 《厦门大学教职员同学团体概况·厦门大学历史学会》,《厦门大学周刊》1934年第13卷19期,第97-127页。

② 黄义祥:《中国经济史专家陈国治》,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编:《岭南史学名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98页。

略了,走到极端”;而唯物史观派则“先入为见”,只会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朱谦之借用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生动比喻,认为治史过分注重史料,只知搜集,不知应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解释,类似于蚂蚁采集食物,谓之“蚂蚁的方法”;反之,过于注重史观,妄加解释,而不知先从事史之搜集,犹如蜘蛛结网,一丝一缕都吐自腹中,在己有以外无所发明,谓之“蜘蛛的方法”。而真正的治史方法则应综合两者,有如蜜蜂采花蜜而酿成芳香甘美的蜂蜜,这种一面搜集一面解释的方法即为“蜜蜂的方法”。如以“蚂蚁的方法”为“正”,“蜘蛛的方法”为“反”,则此“蜜蜂的方法”即为“合”了。

受导师朱谦之的影响,陈啸江接受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但又并未将唯物史观教条化。他在《什么是文化》一文评论唯心派、唯物派以及文化派的文化观,认为唯心派“太看重了精神,把一切文化的源泉,都弄得神秘化了,不知舍却存在,文化是没有意蕴的”;唯物派将阶级论引入文化,然不能处理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的问题。相反的,唯物派与以傅斯年为代表考证派有着显著的不同,因为考证派“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的圈子,把历史看做‘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反对历史哲学,历史与现实完全脱离,让人“痛心之至”,并誓言要一脚踢破“古墓底门”,^①公开批评胡适、顾颉刚为“难师难徒”。在上述的基础上,陈氏提出糅合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大成而“一以贯之”的新配合论。具体来说,他在本体论方面采取“心物一元论”,在认识论方面采取“反映、创造论”。

陈啸江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佃佣制”社会说。他认为中国社会演进的过程非如马克思理论中理想的“步伐整齐”,其封建生产方式,从战国起已开始崩溃,而直至近代,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尚未完成,即从秦汉至清既非封建形态,又非前资本形态,而是到达一种过度的“佃佣制”社会。在史学方法上,主要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但又主张“真实的唯物论者”,不应“呆守”马克思社会分

① 陈啸江:《编辑余墨》,《现代史学》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第243页;《编后》(1932年5月12日),《现代史学》1935年第1卷第3—4期,第367—368页。

期公式。如《三国经济史》一书重点论述关于封建制度的本质及其对三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见解,并详细比较了中外学者对该问题的不同看法。认为过往学界在讨论社会性质时,无不以马克思对于社会史区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市民的为可靠的条件。作者在缜密分析西欧诸多关于封建社会学说的基础上,指出此类学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讨论范围只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所得的结论都是从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寻绎出来的。因此,为“打破前人以欧洲一部民族史为唯一中心,以欧洲一部民族史理论为唯一史学理论的狭窄研究法”,作者广泛比较希腊、罗马、德国、法国、英国、俄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古代国家、美洲古代国等十余国家和地区的各民族之封建阶段的历史,总结出“封建制度者,乃在强制劳动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到氏族高期的胜利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的土地和人口所施行之一种统治形式也”。自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后,秦汉至清,“佃佣劳动”逐渐支配着中国社会的生产过程,期间社会虽经“两三度的逆转”,但仍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三国时期中国仍处于自西汉时期就已形成的“佃佣制”社会发展阶段。

陈啸江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取得研究成绩,引起了德国著名汉学家魏特夫^①的关注。魏特夫是国际东方社会经济史学专家,1936年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委托,来华搜集经济史资料,由北平到南粤,因此前魏氏曾读到陈啸江的论著,二人的学术观点颇有相同之处,故来粤前曾致函陈啸江约其见面交换意见。^②实际上,陈啸江对魏氏也“神交已久”,故在陈氏的论著中对魏特夫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介绍尤多。1940年代末,受魏特夫的邀请,陈氏欲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最后似无果而终。

陈氏曾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掌握重要学术资源的三大“老板”,相应地也受被批评者的极力打压。如傅斯年在审查陈氏申请

① 魏特夫(1896-1988, K. A. Wittfogel),德国人,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德国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平著作极富。

② 原信件中说到:“We obviously have certain scientific ideals in common, I hope very much to be able to see you, before I leave Canton.”见《德人魏特夫格尔博士来校参观》,《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1月3日,第4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时,认为陈氏的史学研究显得“空洞无当”,甚至讥讽其“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① 陈氏的学术研究很难为彼时学术的主流所容纳,加之后来出国后不知所踪,故他的学术逐渐被人所淡忘。这也是此次编校出版陈氏史学文集的关怀所在。

王 传

2018年10月

^① 傅斯年:《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1942年5月),王汎森、潘光哲等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276页。

目 录

丛刊缘起 / 1

前言 / 1

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 / 1

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中国“佃耕制”社会论略 / 25

《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序 / 38

为寻求中国历史何以走不上资本主义之路者进一解 / 46

封建社会崩溃后中国历史往何处去 / 55

二十五史文化史料搜集法 / 100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有无连续的必然性 / 102

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的之意)法则的(非叙述的之意)科学
新议 / 110

封建制度成立的条件及其本质新议 / 137

封建制度成立的条件及其本质新议(续完) / 154

《西汉经济史研究》工作纲领 / 167

《魏晋经济史研究》工作纲领 / 16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问题

——献给开始研究本问题的朋友们 / 171

“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新研 / 217

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画书 / 247

从社会史观点考察五四运动 / 258

我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何以不能发生产业革命”

——鸳鸯绣出与君看 “并”把金针度与人 / 263

从经济史立场对于东方文化的新认识 / 271

中国地理对于中国经济史特殊发展之影响

——“中国历史何以不能发生产业革命”之地理方面的解释 / 288

再论中国地理对于中国经济史特殊发展之影响 / 347

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

◎ 本会特别启事

本文系本会会员陈啸江君为本刊而作,经已印就,拟俟全部印齐,即行出版。詎料厦门《江声报》未征本会同意,竟先将本文刊于元旦特刊,不胜骇异,惟恐读者误为抄袭。除函询该报馆外,特此声明。

厦大历史学会启

- 一、前奏：从中国现代环境下所产生的新史学运动
- 二、过去中国史学界的总结算
- 三、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总结算
- 四、新史学运动的根据一：史的社会
- 五、新史学运动的根据二：社会的史
- 六、相对论与新史学
- 七、唯物论的辩证法与新史学
- 八、统计的研究法与新史学
- 九、新史学的新领域
- 十、新史学的新意义
- 十一、新史学的新研究法
- 十二、尾声：我与新史学

一、前奏：从中国现代环境下所 产生的新史学运动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首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弄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同样，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里亦说：

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覆。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必须从流动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专作无机物的静的分析。从流动中去理解中国经济的结构，必须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阐明其规律性，并挺住其特殊性。

在科学发达的今日，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理性的；自然，社会形式的发展，也不能逃出这个公例。我们要把握中国的前途，我们先要认清现在中国社会进展的阶段，以上所引郭、王二君的说法，也不过此义的引伸罢了。

在此，便发生中国社会性问题。

这个问题发生并不久，可是却因时势的需要，进展得很利害，最近已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主潮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有好几派：有的主张中国仍是停于封建性的；有的主张已经进到资本性的；有的主张半封建性的；有的主张生产基础为资本的而上层建筑为封建的。在拙撰《各色解剖家观察下的中国社会》一文里，已有大体的说明，兹不赘述。不过我们知道他们虽各有一些假设，但仍在论战时期，而未入论定时期，所以这个问题更形严重与普遍了。

研究此种问题的方法，大概可分二种：

（一）横的研究或静的研究——即是要从现代社会的现象里，把握中国的社会性；

（二）纵的研究或动的研究——即是说要从过去历史的进展上，把

握中国的社会性。

以上两种的方法,本是互相参证而无所谓轻重的,但在中国现在社会里,普通的调查与统计多不可靠(譬如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土地分配调查,便大大不同),而鉴别的方法又大有困难,所以横的研究,比较有许多危险的地方。至纵的研究,在我看来,至少有下列各种好处:

(一) 资料比较可靠——在前代,大家既没有党派的成见,自不会捏造事实,误己误人。况我国史官,大都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观春秋齐太史,对于崔杼的记载,便可见史官气概的一斑。至有些伪造的书,亦大概被人发觉,可不至受其欺诳。

(二) 有些资料因果已显——很多事情在同时人莫明其妙,或不觉有什么重要,而后人看去,则因果井然,事实的关系完全可了解。举显的一例说,廿四史列传里,所记某人生于某地,在当时人看去,必不觉有什么,可是在最近学者研究之下,却能将文化移南的痕迹,明显地呈于我们目前。

(三) 事实的来源可寻——现代的种种制度,很多都来源于前代。我们沿流以溯源,决不如由源而竟委。譬如研究中国赋税问题,在没有历史常识的人看去,一定很奇怪现在中国何以没有人口税。但你设能知道前清康熙并丁税于地税的事实,便不难迎刃而解了(按康熙以前户口两税,已并于田租,但户口一门仍有调查,至此始全蠲)。

(四) 偏见不易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人研究现代社会的事实,多少总要受环境的支配,所以在都市居住的学者,每主张中国已入资本的时代;而在乡村居住的学者又每主张中国尚封建,在势力包围中其实都是一偏之见。我们现在纵不能有超时代的眼光,来研究现在的社会性,但却能用现代的眼光,来研究过去的社会性。至得了结论之后,则对于现在的社会,便一样的能把捉,而不致坠于偏见了。

自从新的需要求助于历史的时候,旧日的史学界却根本起了动摇,而有“新史学运动”之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解答是大家对于历史的估价的更换。

以前的历史,可说是为统治阶级写的,即大家读史的目的,也不过取前事以为资鉴、学得怎样治人罢了。所以世界历史最早的发生,总是

一些战争史及君主史,以后形式虽时有改换,但也不脱这两者的范围。现在因要把握中国的社会性,大家便不能不弃从前因袭的思想而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史。社会史主重的骨干,是大众活动的记载,这样一来,便不能由研究统治阶级而来研究被统治阶级了。这一种的转变,可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划分期,亦可谓现代的史学和前代的史学不同的地方。至有意的促成这种转变,便是新史学运动(详细待下叙述)。

最后,我们还附述一个问题。在几年前,大家感着“数典忘祖”的可怕,有整理国故的要求。一时国故先生们风起云涌,你来一篇国故文章,我也来一本国学著作。闹到这几年,光阴总算花了不少,其实他们的成绩又在那里?不用说那些无聊的作品,不值一嗅,即是那鼎鼎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尚有人评为“几曾摸着一些儿边际”,尚有人著着专书来驳斥它。这并不是妄评!因为他们在布尔乔亚的思想模式之下制造出来的东西,除凭主观来排列一些旧书里的材料外,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在新史学运动领导下,虽然也主张研究旧书,并整理旧事,但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象、目的完全与他们两样。最要的,他们研究的结果,只是书肆里多出版一两本新书,而我们研究的结果,则能立即与现生活发生关系。这便是新史学运动与国故学运动分歧的地方!

二、中国过去史学界的总结算

我们校里某位教育先生说得好:“中国过去的教育界,总是受着农村经济的支配,而脱不了封建意识。”(原文待考)其实,中国的史学界,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如思想之类,总与它的生产基础有密切的关系;故我们展开一部中国史学史,也可以看出各时代的社会性。现在,因为篇幅的比例,我们只好将这一题目留待拟著的《物观中国史学史》里去细说,而本文所及的范围,只是将重要时代的重要代表者,略加一些批判罢了。

我们从甲骨文及金文里,知道中国史官起源甚早,不过彼时所记,并没有具体的东西传下,他们的主张又无考察,所以现在从第一个历史

家孔子说起，而下逮清代的章学诚，中间有几代不甚重要者，则略去不说。

(一) 孔丘——孔子的史识，见于《春秋》。《春秋》虽是鲁史的旧稿，但却参有孔子的主观意见，所谓“微言大义”写成的。我们现在对其体裁的散漫，且不深究，但对其取材的方面，实觉不能满意。按《春秋》全部，仅有一万七千余字，而它所记载的，却以：(一) 统治阶级冲突的事迹(如臣弑君、子弑父之类)；(二) 迷信的事迹(如天灾地变之类)；(三) 宫闱的事迹(中间尤注意贞节可嘉的妇人)占大部分。因此可见彼时所谓史，只是一些统治阶级的流水簿而已。故尽其作用，也不过惩乱臣、儆贼子而已——然这却正是封建社会的本色。

(二) 左丘明，左丘明或称左丘，普通以为《左传》与《国语》都是他一人所撰，这虽有待提证，但我们知道有著录这些书的这么一人也便够了。《左传》取材的眼光，虽较《春秋》为胜，但仍不脱惩恶劝善的宗旨。成十四年曾引君子之言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劝善，非圣人其谁能修之。”昭三十一年又道：“《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此外对于大事，如河阳之狩，赵盾之弑，又常引孔子之言以为断，可见其不能脱离《春秋》窠臼的一斑了。

(三) 司马迁——梁任公称中国有司马迁，然后有史学，可见其入一般之价值。但旧社会的人，仍是脱不了旧社会的意识。所以《史记》一书，尚没有群众的精神，而以人物为本位。至人物的比例，自然又以达官大人占大多数。或人对其志书，推崇非常，谓其有社会的眼光，吾无所取。盖志书所以作，说得尖刻点，只是子长炫炫其博学，说得温和点，也只是因人物传里，不能容这些材料罢了。他的书那里配得上社会史，他的人又那里配得上社会史学家！

(四) 班固——班固更无用了。司马迁尚有比较远大的眼光，班固所见的，却不过刘汉的一朝。不过《汉书》的体裁，是后来各正史所效法，故不能不说说他。按《汉书》的体裁，系断代的，而所记的史实，又完全以帝室为中心。从此之后，所谓某代的正史，实只是某代帝王的家谱，而“会通之道”，亦“自此失矣”(引号内系郑樵语)。